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变迁的探究

卢钟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 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变迁的探究

卢钟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变迁的探究 / 卢钟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4879 - 2

I . ①中… II . ①卢… III .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82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黄燕生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四大街甲 150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2

字 数 435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文 黄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实践研究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社会形态与历史发展总论

第一章	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思潮的演变及其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观	(3)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	(44)
第三章	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论与方法	(107)
第四章	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相关理论问题与基本思路	(135)
第五章	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当代意义与学术理论价值	(165)

第二编 社会形态与历史和文明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	(181)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	(203)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	(216)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228)
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	(239)

第三编 20世纪中国历史观念和历史学

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历史观念及其演变	(251)
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284)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思考

——以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为线索	(312)
新中国历史学创建时期历史研究的新进路	(331)
新中国历史学六十年与社会形态问题研究	(346)
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365)

第四编 思想文化的转型

由传统走向启蒙

——论 18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377)
论清末的文化转型	(384)
儒学的历史命运与现代新儒家的儒学转化观	(394)
回顾国学 反思国学	(409)
国学的历史及其启示	(417)
后记	(433)

第一编

中国社会形态与历史发展总论

第一章 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思潮的演变 及其中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观

20世纪以来，西方的史学思潮几经变化。大体来说，20世纪前半叶是传统的欧洲中心史观占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还有治水社会史观。从20世纪后半叶起，传统的欧洲中心史观逐渐淡出西方史坛，代之而起的是文明形态史观、全球史观以及后现代史观。它们接踵而至，一浪高过一浪。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些后起的史学思潮对于中国史坛所产生的影响。

西方史学思潮的演变直接影响到西方史坛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各自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观。

第一节 欧洲中心史观及其中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观

一 欧洲中心史观的由来

欧洲中心史观是20世纪前半叶西方盛行的世界历史观。然而，这种世界历史观由来已久。这得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说起。

如所周知，18世纪后期开始的这场革命对欧洲的历史进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① 不仅如此，“由于一切生产工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1页。

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使“资产阶级”有可能“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 总之，这场革命大大加快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使原来落后的欧洲一跃而成为居于世界前列的先进的欧洲，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与东方国家的历史差距。于是，自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以来，所谓东方落后论、欧洲先进论，以及按照欧洲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声浪一度甚嚣尘上，成为风行西方的史学思潮。欧洲中心史观就是对于这一思潮的理论概括和总结。19 世纪，随着欧洲支配世界地位的确立，欧洲中心史观因而主导了西方史坛。

19 世纪主导西方史坛的欧洲中心史观，其理论形态是由黑格尔完成的。

黑格尔（Hegel, 1770—1831）是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杰出代表，西方近代的历史哲学在他那里达到了顶峰。他的最大贡献是：把辩证法运用于研究世界历史，并由此得出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认识。恩格斯说：根据这一认识，“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认为，这是黑格尔的“划时代的功绩”。^② 不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正如罗素（B. Russell, 1872—1970）所说，是以“精神和精神的发展过程”为“实在对象”^③ 的。因此，他所谓世界历史，实质上既是精神的发展过程，又是作为精神的本质——自由的实现过程。他将这一发展过程划分为三种实现形式：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它们分别代表自由的三种实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东方世界的专制政体，第二种形式是希腊罗马世界的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形式是日耳曼世界的君主政体。这样，黑格尔通过对精神发展过程的诠释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以精神发展为主线并外化为政体演变的三形式和三阶段的世界历史体系。根据这个世界历史体系，“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6 页。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37 页。

^③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283 页。

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① 这里，他所说的欧洲和亚洲，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分别代表西方和东方，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分别代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体，并明确地提出东方专制政体的概念而与西方的政体即从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到日耳曼的君主政体相区别。他断言：东方专制政体属于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政体，希腊罗马的政体属于“少数人”是自由的政体，日耳曼的政体属于“一切人是自由”的政体；^② 认为西方的政体优胜于东方的专制政体，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和终极目标，故说“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这种以欧洲为历史终点的欧洲历史终结论，毋庸讳言，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史观。用欧洲中心史观考察中国历史，黑格尔认为：“中国是特别东方的。”^③ 根据黑格尔关于东方专制政体的概念，所谓“中国是特别东方的”，是说中国的政体为典型的东方专制政体，它保持着东方专制政体固有的特性，概要地说：

一是，权力的唯一性和独占性。用黑格尔的话说，即“一切皆隶属于”专制君主这个“唯一的个人”，“以致任何其它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国家的一切因素”“都被这个实体所独占”。在这“唯一的权力”面前，“没有东西能维持一种独立的生存”，^④ “所以政体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⑤

二是，权力的家族性质。所谓权力的家族性质，是指“这个国家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而言的。所以，中国的政府是一个“父道的政府”，^⑥ “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⑦ “家长政治的原则”是国家立法的根据。^⑧

三是，历史的不变性。由于中国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立法的根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8页。

^② 同上书，第56—57页。

^③ 同上书，第158页。

^④ 同上书，第150页。

^⑤ 同上书，第169页。

^⑥ 同上书，第150页。

^⑦ 同上书，第165页。

^⑧ 同上书，第171页。

据是“家长政治的原则”，且“终古如此的固定不变”，因此，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不必有什么变化”，^①也“无从发生任何变化”。^②唯其如此，他称中国历史是“永无变动的单一”^③，它“很早就已经进到了今日的情状”，^④即强调中国历史自古以来的不变性。

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Schelling, 1775—1854）更将中国的专制政体径称为“皇权绝对至上”的“独裁的君主制”，认为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国家形态”，秦始皇只不过是其“复制者”，从而强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原创性。他进而指出：这种“皇权绝对至上”的观念是“国家权力绝对集中”的反映，其根源在于“最古老的家长制原则即父亲的权力和威严至高无上的原则”，认为这是“中华帝国”的“本质特征”，也是“这个国家至今保持着四千年前的面貌”^⑤的原因所在。与黑格尔一样，谢林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家族关系和家长制是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不变性的最后根据。

综上所述，主导 19 世纪西方史坛的欧洲中心史观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东方专制主义为理论出发点，强调东方专制主义作为政体形式的所谓不自由、非理性的专制性质，而与欧洲政体的所谓开明、理性的自由性质相对立，并用这种西方政体“优越论”的政体观作为立论的依据。

第二，以欧洲历史终结论为理论归宿点，强调按政体划分的东方世界从属于西方世界的历史必然性，旨在证明欧洲历史的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首先是东方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以中国专制主义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源头，强调中国历史的东方专制主义特征，将中国历史进程纳入欧洲中心史观的体系框架内，突出中国历史的不变性及其家长制根源。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51 页。

② 同上书，第 161 页。

③ 同上书，第 158 页。

④ 同上书，第 161 页。

⑤ 以上引文均见于柳御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谢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3—231 页。

由此可见，所谓欧洲中心史观，实质上是欧洲历史终结论的世界历史观，而东方专制主义和中国历史不变性，则是这一世界历史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必须指出，虽然作为理论形态的欧洲中心史观是由黑格尔完成的，但是黑格尔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和关于东西方的政体观念则是渊源有自。例如，关于中国专制政体问题，早在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中国札记》一书中已经提出来了。他不但对中国历史做出正面的评价，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征服的野心”，而且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皇帝和朝廷对人民拥有绝对的权力^①。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和魁奈（F. Quesnay，1694—1774）也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论述“中华帝国”的专制政体问题。不过，孟氏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一种以“恐怖”为原则的制度^②，而魁氏则认为虽然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但都是按自然法则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的专制制度是最合乎人类理性的制度^③。又如，关于东西方政体的划分，孟氏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作了专门的论述，认为专制政体是东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政体，而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则是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政体，并断言：西方的政体优于东方的政体^④。可见，关于中国专制主义和东西方政体的认识，早在17—18世纪的西方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上述认识可以说是西方的传统观念。所不同者，17—18世纪的上述认识没有同世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因而没有由此做出中国历史不变性或欧洲历史终结论的结论。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的开明程度都远不及中国。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面貌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以及东方国家才被欧洲抛在后面，所以，中国历史不变性和东方历史落后论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欧洲中心史观的兴起及其主导19世纪的西方史坛，或者说，这一世界历史观的由来不仅有其思想文化背景，而且有其社会历史

① [意]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②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9页。

③ 魁奈：《自然法则》，《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页。

④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56—60页。

背景。

二 20世纪欧洲中心史观的新特点与费正清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观

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史观主导西方史坛的局面至20世纪前半叶不仅循而未改，而且更发展成为一种解读中西方关系和东西方关系的历史模式，这就是盛行于20世纪前半叶西方史坛的“冲击—回应”的历史模式。

所谓“冲击—回应”，简单地说，就是西方挑战，非西方国家应战。这一历史模式是1954年由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一文和克莱德与比尔斯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一书中正式提出来的^①。根据这一历史模式，西方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具有历史的主动性，居于历史的“上风”，处在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由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历史的主动性，居于历史的“下风”，被排斥于世界历史的边缘，只有借助来自西方国家外力的推动，才能走上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由传统走向近代，实现现代化。

欧洲中心史观在20世纪的演变是受西方国家利益的驱动，为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政策辩护的。因此，同19世纪的欧洲中心史观相比，20世纪欧洲中心史观更具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要首推费正清及其《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两书。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他长期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其研究成果深为美国政府所重视。1948年，他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在美国政界和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依据，被称为研究中美关系的“经典著作”。^② 1978年，他和赖肖尔根据《东亚：传统与变迁》（费正清、赖肖尔、克瑞克合著）一书有关中国部分进行修改和增补，以《中国：传统与变迁》为题，单独成书出版。

费正清上述两书的最大特色是：以“冲击—回应”的历史模式作为研

^①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页。

^②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赖肖尔第四版序》，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究中国历史的指导线索，将中国历史分成“传统”与“近代”两部分，着重探讨传统的中国如何“回应”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所造成的“冲击”。用他的话说：“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本书因之亦分为两大部分：3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在相对隔绝的状况下的衍变，以及自近代以来作为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回应，这一文明所经历的变故与转型。”^①他用以划分传统中国和近代中国的标志性时间和事件是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此前是传统的中国，此后是近代的中国。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开始的；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历史仍然停留在“传统文明”这种“相对隔绝的状况下”。可见，费氏“冲击一回应”的历史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历史停滞论之上的，而由中国历史停滞论必然得出“传统—近代”断裂说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观。

必须指出，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谢林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不变论相比，费氏关于中国历史停滞论的最大特点是：他承认中国历史在“传统范围内”的某些变化，即他所说的“3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在相对隔绝的状况下的衍变”。这突出表现在中唐到宋末（8—13世纪）即“中古期的昌盛”。他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远比欧洲先进”。其中，最重要的是“兴起国内外的私人贸易”。他称“这确实是一场‘商业革命’”。^②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水稻耕作的推广又有利于小土地私有者的发展，而这是由于水稻耕作的性质决定的。他还特别提到罗斯基的发现：到了明代，华中、华南部分地区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为目的。^③所以，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亦称“前近代”或“前现代时期”，“因为这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

值得指出的是，费正清关于中国历史“在传统范围内的衍变”观是建立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两重性的认识基础上的。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

^① [美]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30页。

^③ 同上书，第31页。